

#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sup>\*</sup>

——以浑源州为例

曾 伟

**提 要:**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

**关键词:** 明清易代 地方志 地方社会 浑源州

明清易代之际作为社会剧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对这一时代的研究有颇多学者的关注。陈春声通过潮州的个案,将“倭乱”和“迁海”两个时代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揭示地方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和过程。<sup>①</sup> 岸本美绪通过“后十六世纪问题”的提出,将清代的历史纳入整个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范围内进行考察。<sup>②</sup> 赵世瑜主张从区域社会史角度整体的去看明清易代的问题。<sup>③</sup> 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地方志的修纂在讨论明清易代问题上,无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地方志是记录一定区域内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sup>④</sup> 现存明清两代地方志的数量,在古方志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sup>⑤</sup> 广义的地方志,包括了以行政区域为界的省、府、州、县志,也包括了记载山水景观的山志。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区域社会文化史角度将地方志作为文本进行研究,关注地方志编纂中的话语表述、文本权力和族群关系。程美宝通过对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研究,表明地方精英通过编写乡土教材,重新界定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并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捍卫自身的利益。<sup>⑥</sup> 谢宏维通过晚清民国万载地方志的分析,展示了地方士绅如何借助地方志的纂修,表达其对地方历史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由此可见不应将地方志仅仅视为地方历史的客观记录,更要看到地方文献建构的过程,本身也是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⑦</sup> 李晓方通过对明清《瑞金县志》的考察,发现明清时期数个具有密切姻亲关系的大族掌握了瑞金县

\* 本文曾提交2017年8月12日在太原召开的“长城内外: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边塞地带的人群、生计与社会进程”学术研讨会讨论,得到彭建英教授、李鸿宾教授、邱仲麟教授的点评,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 ① 参见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 ② 参见[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 ③ 参见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 ④ 参见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 ⑤ 根据来新夏的初步估计,仅清代地方志占我国旧志总量的80%以上。参见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 ⑥ 参见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⑦ 参见谢宏维《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地方志的编纂，主导了地方社会的话语权，由此提出地方志“族谱化”的问题。<sup>①</sup> 上述研究的基本预设是地方精英阶层掌控了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命脉，并借助地方志的纂修，通过国家话语的表达，实现对地方历史话语权的掌握和操控。其极端的情形甚至是将地方志由公器变成私属，使之沦为私家谱牒之附属。由此提醒我们不应将地方志视为客观历史的记录，更要关注文本编纂背后的权力文化关系。然而，在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和地方精英稀少的北方边塞地区，鲜少祠堂的营建和文集的编著，更毋论族谱的编修。那么，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地方志纂修如何进行？张继莹通过对《偏关志》版本源流的考察，指出该书经历清代以来私修手稿形式的保存与流传，并最终在民国初年刊刻的过程。从而探讨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士绅通过地方志编纂，寓褒贬于隐秘，隐没当地明清之际投降和反复的历史。<sup>②</sup> 然而作者并未对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志编纂的情形进行深入讨论。本文从历史文献的解读出发，以浑源州为个案，探讨明清易代之际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浑源州即今之浑源县，位于山西东北部，面积 1966 平方公里，东接广灵，西毗应县，东南以恒山与灵丘、繁峙县分界，北面与大同、阳高相连。万历《浑源州志》称浑源是“居并代之间，俯云朔之塞，恒岳表于《禹贡》，呕夷述于职方，八山环拱而风气聚藏，八水交流而金汤奠丽，号曰神川”<sup>③</sup>。浑源州地方志的纂修，始于宋建炎、绍兴年间朱弁纂《浑源州记》。前后凡九修，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是顺治十八年（1661）纂修的《浑源州志》（以下简称“顺治志”）。<sup>④</sup> 与此同时，浑源州境内的恒山，即五岳之中的北岳。五岳之中泰山、华山、衡山、嵩山各有专志，均为地方士绅或显宦所编，唯独明清以来的《恒山志》编纂，与浑源州地方志的纂修有密切的关系，构成了山志与州县志密切的互动关系。<sup>⑤</sup> 万历《浑源州志》（以下简称“万历志”）的编纂者，已经将境内的恒山视为五岳之一，志中开篇就写道“云中四州，浑源独称胜也。以在恒山下也，恒山为五岳之一，与泰、华、衡、嵩雄镇宇内。”<sup>⑥</sup> 顺治十七年清王朝确立北岳移祀浑源，次年《恒岳志》纂修完成。<sup>⑦</sup> 在时间上，顺治《恒岳志》的纂修与顺治志同步，自此山志与州志同修，成为浑源州的惯例，这在清代方志编修中十分罕见。笔者希望借由顺治《恒岳志》和《浑源州志》的考察，结合其他地方文献的解读，对明清易代之际的浑源州地方社会进行初步的研究。

① 参见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史林》2013年第5期。

② 参见张继莹《只恐遗珠负九渊：明清易代与〈偏关志〉书写》，《明代研究》第27期，2016年12月。

③ 万历《浑源州志》卷1《形胜》，第3页。

④ 参见祁明《同朔地区历代地方志编纂、收藏事略》，《雁北师院学报》（文科版）1995年第1期。现存明代浑源州地方志有弘治六年（1493）董锡修、杨大雍纂《浑源州志》（存卷5）和万历三十九年（1611）赵之韩修、王浚初纂《浑源州志》，笔者仅在犹他家谱网见到万历《浑源州志》的第1卷。参见刘纬毅《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160页。

⑤ 有关山志的研究有张群《南岳山志研究》，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张群《近三十年山志研究述评》，《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杜玉玲《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李凭《评山西的三部方志》，《五台山研究》1985年第1期等。

⑥ 万历《浑源州志》卷1《凡例》，万历三十九年刻本，第1页。

⑦ 有关北岳移祀的问题，参见牛敬飞《从曲阳到浑源：北岳移祀过程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经典的屈从：北岳移祀的知识史考察》，《历史地理》2011年第1期；《明代北岳信仰转移及其军事背景》，《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齐仁达《明清北岳祭祀地点转移之动态考察》，《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李婧《明清北岳改祀的原因和对浑源地方的影响》，山西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一 重建礼教秩序——顺治《浑源州志》的纂修

明清易代之际，浑源州经历了明军、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反复争夺。<sup>①</sup> 顺治五年（1648），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浑源州守备唐虎附姜瓖为乱，软禁知州荣尔奇，并于顺治六年将其杀害。同年三月，清军克复浑源城，州境归附清朝版图。经过“姜瓖之乱”后的浑源州，“城中黎庶屠戮八九，妇女半为俘获，房舍焚拆几尽，乡村搜掠一空，兵燹之惨，未有甚于此者”<sup>②</sup>。加之明末清初，州境内频繁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兵灾之祸，全州人口急剧锐减。<sup>③</sup> 万历四十年（1612）浑源州人口有1379户、12121口（含男子、妇女），至顺治十六年仅剩154户、3205口。<sup>④</sup> 对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地方社会而言，已经没有更多的经费来支持地方志修纂。因此，顺治《浑源州志》的修纂是知州张崇德本人独力出资完成，并没有动用民间捐助。<sup>⑤</sup> 张崇德，字懋修，辽东籍永平府昌黎县人（一说为北平人），顺治十五年以渭南令升任浑源州知州。<sup>⑥</sup> 辽东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从那里出来的官员，对清王朝更有认同感，也更容易被清朝统治者委以重任，派往各地担任地方军政首脑。<sup>⑦</sup> 在浑源州任职期间，张氏多有德政，地方志中记载如下：

公实心任事，明敏有为。自下车来，问民疾苦。培士风，振颓俗。清刑简政，公赋平徭。捐资余米，施赈济饥民。禁革里马里夫，苏民力，剔积弊，设立义仓，捐俸余谷贮备救荒。囹圄空虚，无疑狱，无冤民。因虑城关不属，创立顺成街市集，贸易者聚，流移者来，逃遁者复，荒芜者垦，熙熙然大治焉。捐己资修恒庙，理衙舍，建玉阁，兵燹后焕然一新。本朝荣守因姜逆之变殉难死节，力请上台配入名宦。《州志》《恒志》，城破无存，捐金修辑。凡兴利除害，靡不留心，邑人德之，而愿借冠者也，立石文庙以颂焉。<sup>⑧</sup>

这段关于知州张崇德的记载是以王躬正为首的一批庠生撰写的，而他们正是顺治志的采辑人员，现整理如下：

- ① 参见乔志强《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449—460页。
- ② 顺治《浑源州志》下卷《叛逆》，第8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第7册，第236页。
- ③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下卷《灾异》，第79—80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34—235页。该志记载：天启六年（1626）夏六月地震，崇祯二年（1629）大饥，崇祯十六年大疫，顺治三年（1646）蝗灾，顺治十四年秋九月地震，顺治十七年旱，顺治十八年地震。
- ④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户口》，第40—4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6—177页。根据顺治《浑源州志》记载，顺治十五年至十七年，招徕复业人丁有272丁，而根据招垦土地记录信息显示，顺治十五年招垦荒地19.19顷，顺治十六年招垦荒地127.27顷，顺治十七年招垦荒地4.39顷，总计有150.85顷，人均耕种面积达0.55顷，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清初的人口统计中当有隐漏的情形。
- ⑤ 参见赵开祺《浑源州志后序》，见顺治《浑源州志》，第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51页。
- ⑥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职秩志》，第3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3页。
- ⑦ 根据乾隆《浑源州志》的统计，顺治年间，浑源州的知州共有6位，来自辽东或辽东籍者有5人，占绝对的优势。参见乾隆《浑源州志》卷5《职官》，第27—28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第7册，第321—322页。
- ⑧ 顺治《浑源州志》上卷《职秩志》，第3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3页。

表1 顺治《浑源州志》纂修名单

姓名	身份	志局任职	姓名	身份	志局任职
张崇德	知州	纂修	赵开祺	延安府推官	参订
刘芳俊	儒学学正	校阅	李亨	庠生	采辑
徐有德	贡生	采辑	常启明	庠生	采辑
李达	贡生	采辑	杨震亨	庠生	采辑
王躬正	庠生	采辑	李映蔚	庠生	采辑
宋运鸿	庠生	采辑	张亮熙	庠生	采辑
阎佳凤	庠生	采辑	刘国盛	庠生	采辑

资料来源：顺治《浑源州志》卷上，第2页

庠生即州县学的生员，是地方社会知识阶层的代表，更被地方官员视为“读书种子”。万历志的编纂，就借助了生员参与，只是他们的工作不是采辑资料，而是校正。万历志中参与校正的庠生有8名，其中翟琬、翟琬均为乡贤翟廷楠之子。<sup>①</sup>让庠生参与地方志资料采辑，既体现了易代之际地方政府搜集地方文献，体察民情的努力，也具有笼络地方知识分子，振兴文化的意义。正如张崇德在《纂修州志行学询采事迹帖文》所言：

矧今山河虽故，玉步已更，时势相悬，风景不一。兴废存亡之升输，因革损益之殊途，因阙而阙，胡以佐代将之观风；由讹传讹，奚以副循良之古镜。则修举为今日之要务。……该学才雄绣虎，穷金匱之秘藏；崇擅雕龙，储木天之伟抱。著作草玄堂，绍扬雄之美迹；校书天禄阁，继刘向之芳踪。展大有为之才，建三不朽之业。<sup>②</sup>

这些州学生员，在参与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通过整理地方文献、挖掘本地历史文化，使他们日后逐渐成为地方文化的代表和中坚力量。如庠生中的刘国盛当时就进入地方志的人物志。顺治志记载如下：

国朝刘国盛，州学生，好善乐施，周贫济困，有古义士之风。……予甚嘉之，以为积德施仁，必昌其后，赠以匾曰“迈种高门”，聿彰其义。<sup>③</sup>

可以说，张氏纂修地方志的行为本身，就起到了宣扬风化的表率作用，培养了一代士风。庠生中

①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下卷《贡选》，第7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98页。万历志中参与地方志校正的8名庠生，有7人列入贡选，几乎都授予官职，分别有白尚焕，太原府教授；陈惊，饶州府通判；张复纯，鄱陵县教谕；翟翔，洪洞县教谕；翟琬，太原府训导；翟琬，不详；黎民化，曲沃县教谕。

② 张崇德《纂修州志行学询采事迹帖文》，顺治《浑源州志》下卷，第9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41页。

③ 顺治《浑源州志》下卷《义侠》，第1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02页。

的李亨、宋运鸿、张亮熙成为贡生，其中宋运鸿授孟县训导。<sup>①</sup>这些人显然都成了地方精英。当然，未载入地方志者，未必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如常启明出身书香门第，精通制义，家学渊源深厚，他的曾孙常康侯就是浑源籍名宦栗毓美的恩师。<sup>②</sup>诚如万历志所言“州不乏甲榜，而最显者不尽甲榜中人也。”<sup>③</sup>方志修纂，为地方社会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同时，方志的修纂保存了地方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张氏重建社会秩序的良好用心，如振兴文教、复兴礼乐、公平赋役和稳定秩序等。这些举措及其影响，在顺治志中得到了体现。顺治志修纂之时，旧志因兵燹蹂躏“楔梓遗失”，因此不得不重新刻版印刷。<sup>④</sup>方志雕版的遗失，并不等于地方志的亡佚，只是“篇简断残”未得完璧而已。因此，在编纂过程中知州张崇德在动员生员搜集地方志资料时，要求尽可能做到“虽寸长而并录，即一得以兼收”，<sup>⑤</sup>并通过征访故老贤士“积而成帙”。同时在修纂原则上坚持“古昔之所已载者，不敢益而亦不敢损；今日之所宜载者，不敢讳而亦不敢遗”<sup>⑥</sup>。其言外之意也表明不宜载的内容，统统不予收录。仅以艺文的采录为例，“艺文惟志纪实事、咏古迹者，如褒纶、愍册、堂记、墓铭宜在家藏，无关邑乘，削而不录”<sup>⑦</sup>。可以说顺治志在成书过程中，对搜集的文献进行了有意的筛选和删削。相较于前朝旧志，尤其是万历志，顺治志则多有新创。

首先是舆图。顺治志的舆图包括疆域图、城池图、州治图和学宫图，与万历志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仅在于州治图中州衙的“牧爱堂”更名为“岂弟堂”，“望云楼”改名为“耀德楼”。“岂弟”语出《诗经·小雅》“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耀德”语出《国语·周语》“先王耀德不观兵”。上述表明张氏上任之后，意在致力于修养德行和宣扬德化。

其次是体例的新增。万历志总共有9志，计两卷。而顺治志则计有10志，分上下两卷。现将万历志与顺治志的体例比较，列表如下（见表2）。

表2 万历志与顺治志体例比较表

万历《浑源州志》	顺治《浑源州志》
舆地志（沿革、分野、疆域、形胜、山川、风俗）	舆地志（星野、山川、沿革、里社、风俗）
建置志（城池、州治、学宫、坛庙、公署、坊表、里社、堡寨、关市、亭堠、津梁、丘墓）	封建志（城池、州治、坛、关梁）

- ① 参见乾隆《浑源州志》卷5《科目》，第17—18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316—317页。
- ② 参见栗毓美《常康侯公教泽碑》，《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卷续编》，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
- ③ 万历《浑源州志》卷1《选举志》，第36页。
- ④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凡例》，第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55页。根据对万历志和顺治志的版本考察，万历志每半页有10行，是每行满行20字，顺治志每半页10行，每行满行24字，由此可以认为两版地方志并不是用同一块版，顺治志为单独刻版印刷。同时，根据顺治《恒岳志》版刻分析，该志也是每半页10行，满行24字，因此笔者推测顺治《浑源州志》和《恒岳志》当为同时刻版印刷。
- ⑤ 张崇德《纂修州志行学询采事迹帖文》，顺治《浑源州志》下卷，第9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41页。
- ⑥ 张崇德《浑源州志叙》，顺治《浑源州志》上卷，第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48页。
- ⑦ 顺治《浑源州志·凡例》，第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55页。至于顺治志中删除了哪些内容，因没有更多的文献资料佐证，不得而知。

(续表)

万历《浑源州志》	顺治《浑源州志》
食货志(户口、田赋、丁赋、物产)	职秩志(牧守、广文、守备)
兵政志(兵籍、屯田、器械、方略)	赋役志(户口、田赋、起存、归并、课程)
职官志(官制、题名、宦迹、世胄)	学校志(庙学、乡饮)
选举志(荐辟、进士、乡举、岁贡、封荫、例贡、武举)	选举志(荐辟、甲第、封荫)
人物志(乡贤、寓贤、孝行、贞烈)	人物志(贤哲、忠孝、贞烈)
艺文志(集文、集诗)	兵戎志(兵制、教场)
丛纪志(古迹、寺观、技艺、灾异、兵变、公移)	艺文志(碑记、序传、祝词、诗赞)
	丛纪志(灾变、古迹、技艺、侨寓、叛逆、兵燹、公移)

通过两志的比较可以看出,顺治志在体例上也多沿袭了万历志,所不同者在于将原附于建置志内的学宫,单独析出,与乡饮共同构成了独立的学校志,至此由九志变成十志。之所以特地增加学校志,意在“右人文”。同时将久已失载的诸多礼制搜集起来,以达到“明典礼教化”的目的。<sup>①</sup>顺治初年,知州郎永清将学宫修葺一新,“牌主饰以金朱,牖壁垩以丹粉,池桥环以雕墙”。而张氏任内,则“其楔之门,易以朱雀凌霄之样”。学宫因此灿然改观<sup>②</sup>。学宫的重修,尚属外貌的改观,更严重的问题是“州县学校久为旷废,竟无稽古礼而复旧制者”。甚至在礼乐中“用优伶夫侏儒,乃匪人筋策,非华乐”<sup>③</sup>。因此,比重建学宫更紧迫的任务,是重新恢复学宫的祭仪和乐章,重建礼乐制度。诚如志中所言“俾泮宫礼乐、仪器展卷了然,名氏位序晰如指掌,言虽,意非诞妄,或于崇儒正礼有小补云。”<sup>④</sup>

礼乐制度重建的另一项工作,即为乡饮酒礼的恢复和乡约的强调,意在突出耆老和乡约的社会教化和道德感召之功。地方志中对饮仪和乡约仪式的记载,其用意正在于此。顺治九年(1652),清政府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言”,颁布“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的教民六谕。顺治十六年,设立乡约制度,讲解六谕原文,设约正、约副为讲解人员。<sup>⑤</sup>每月朔望,令约正约讲在所振铎讲训,官吏士民,咸集拱听。然而,在浑源州乡约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至张崇德到任时,乡约已久废不行,只有约正、约副六名,宣讲乡约的地点也由旌善亭、申明亭改在了永安寺和城隍庙内。<sup>⑥</sup>对于乡饮和乡约的存在意义,张氏的理解是“义虽近庸行庸言,然孝友姻睦恤任之道备焉,三物六礼七教八政之法存焉,移风易俗,治国平天下,道莫要乎是”<sup>⑦</sup>。当然,乡约和耆老的作用不仅仅是仪式上的宣示,

①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凡例》,第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55页。

②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庙学》,第55—56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84页。

③ 顺治《浑源州志》上卷《乐章》,第7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92页。

④ 顺治《浑源州志》上卷《乐章》,第7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92页。

⑤ 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97《礼部·风教·讲约一》,转引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9页。

⑥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乡约》,第77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95页。

⑦ 顺治《浑源州志》上卷《乡约》,第77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95页。

还负有具体的地方事务，如恒山每年朝山的香税就是由乡约和耆老共同监收。<sup>①</sup>

最后，忠孝观念的强调。顺治志的人物志增加了“忠孝”条。编者在前言中强调“忠孝本于天性，故仗节弗辱朝廷之令，□孤不惮鞠瘁之劳，力尽而身陨，危城国败则义明绝域。”<sup>②</sup> 忠孝人物中，明人王诚、石薰和孙震原载于万历志中的“孝行”。张汝舟原本见诸万历志“乡贤”，此处则单独抽出附入忠孝传中。张的事迹是任顺天大城县令时，孤力守城，城破后仍坚持巷战，与其子同时遇害，死后得赠光禄寺丞，赐祭葬。<sup>③</sup> 其意在强调民众对王朝的忠诚。

与忠孝对立者是叛逆，附入“丛纪志”中。在顺治志中，“丛纪”的创立意在于收录“诸志之所不收，又不可不收者，纪其变，而记其余”。乱贼叛逆者属于“心性之变”<sup>④</sup>。列入叛逆的人物，明代有朱克灼，代藩宗人，嘉靖二十四年（1545）勾结北狄入寇内地。<sup>⑤</sup> 清代则有唐虎和方应祥两人。唐虎，陕西人，顺治四年（1647）任浑源州守备<sup>⑥</sup>，追随姜瓖作乱。方应祥，为宝峰寨人，系明乐府宗室，姜瓖之乱中，受副将伪札，协守浑源。方劝知州荣尔奇归顺，荣氏不从，被唐虎重伤，并囚于玄帝庙。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形下，荣被贼众杀害。清军围剿浑源城，方应祥力战被杀，唐虎自焚而死。<sup>⑦</sup> 虽同为叛逆，作为官员的唐虎与作为前朝宗室的方应祥却有不同的表述。对于方应祥，志书不惜用极端语言表达“方应祥等以么□数子，谋为不轨，弑杀州刺，抗拒王师，造祸黎庶，辜恶通天，神人愤怒，即身膏斧钺，殄绝嚙类，犹未蔽辜。……若辈之白骨而齑粉之，犹未足释恨也。”而对于前守备唐虎则用的是“其罪当诛，其心更可磔也”。以此书于志乘，“俾遗臭于后世，兼以儆天下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便知为口诛笔伐之所不宥也”<sup>⑧</sup>。志书既有“叛逆”的设立，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中“百姓屠戮殆尽”的责任，便归咎到这些人身上。同时，在“姜瓖之乱”被杀害的浑源州知州荣尔奇得到了褒扬。荣氏在浑源州任时，“刚毅明达，字民恺弟慈祥，法简刑清，爱人造士”，在百姓中有很好的声望。因此在他被叛军杀害后，由本州生员恭请，知州张崇德上奏旌表入祀名宦祠。<sup>⑨</sup>

可以说，通过顺治志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易代之际地方官振兴文教、恢复礼制、繁荣经济、改善民生以及重建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甚至被地方士绅视为再造浑城之功。<sup>⑩</sup> 地方志的编纂者，也希望后来者能够“披卷而指者曰：浑之土地如是，浑之人民如是，浑之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以迄乎时势殊异，事物变迁又如是，是亦眉列而展卷而可以了然者”<sup>⑪</sup>。

## 二 重构国家认同——恒岳祭祀问题的考察

早在明代，浑源州地方官员在纂修州志时，便有意收集与恒山相关的艺文，其篇幅几乎达到

① 参见邓源：《恒山永革陋规碑记》，康熙六年（1667）八月立于恒山飞石窟，《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县卷》，第103页。

② 顺治《浑源州志》下卷《忠孝》，第1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01页。

③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下卷《忠孝》，第1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02页。

④ 顺治《浑源州志》下卷《丛纪志》，第79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34页。

⑤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下卷《叛逆》，第8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36页。

⑥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守备》，第38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5页。

⑦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下卷《叛逆》，第8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36页。

⑧ 顺治《浑源州志》下卷《叛逆》，第82—8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36页。

⑨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牧守》，第3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2页。

⑩ 参见张崇德《申请荣守配祀名宦详》，顺治《浑源州志》下卷《公移》，第90—9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40页。

⑪ 顺治《浑源州志·叙》，第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48页。

了州志的一半。这些诗文的收集，为山志与州志的分离，实现山志的独立编修，提供了基本的资料。至万历年间，知州赵之韩与王濬初终于同时完成了万历年间的《恒岳志》和《浑源州志》的修纂。<sup>①</sup>为此万历志《修志凡例》写道：

恒山为五岳之一，与泰、华、衡、嵩镇宇内。泰、华、衡、嵩皆有《志》，恒独无，灵迹高文杂见《州志》几半帙。夫核故实，稽善败，宜专志州；纪神异，考秩祀，宜专志岳。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也。<sup>②</sup>

这段修志凡例中，透露了两条信息：第一，至万历时期，在浑源人的观念中，境内的恒山已经是与泰山、华山、衡山和嵩山齐名的五岳中之北岳。第二，从方志编纂来看，由于与恒山相关的艺文大量存在，已经到了占据地方志大半篇幅，势必在体例上打破原有方志的格局，独立成帙，此所谓“离之双美、合之双伤”的原因所在。当然由于明代仍遵循曲阳为北岳正祀所在，始终未承认浑源的恒山为北岳，因此万历《恒山志》中仍收录《曲阳岳庙诗》，附于卷末。赵之韩后因“以非罪罢”，《恒山志》最终在张述龄知州任内刊刻完成。张述龄，字九鹤，生卒年不详，衡阳县举人。在浑源州任内，栽种官道树木，创建恒岳行宫、泰山庙、文昌阁、魁星楼等，后郡人塑像文昌阁中祭祀。<sup>③</sup>这位来自南岳的地方官，明白《恒山志》刊刻，对于浑源州的巨大意义，玉成此事，在山志编纂历史上可称佳话。

顺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确立浑源为北岳正祀所在。次年，知州张崇德捐资纂修《恒岳志》完成。<sup>④</sup>顺治《恒岳志》在体例上仍参照了前代志书，分为3卷15目，各卷分别为上卷《星纪》《山纪》《庙纪》《祀纪》《事纪》《岳纪》；中卷《物纪》《游纪》《仙纪》《文纪》《碑记》《祭文》《考辨》，下卷《疏纪》《诗纪》。<sup>⑤</sup>相较于万历《恒岳志》2卷11目，顺治版在沿革万历版的前提下，增加了1卷4目，即《碑记》《祭文》《考辨》《疏纪》4目为新增内容，也构成了文本分析的基础。<sup>⑥</sup>虽然清王朝承认了北岳祭祀从曲阳移祀浑源的事实，但是顺治《恒岳志》对于在曲阳的碑记也“间有采入”<sup>⑦</sup>。

顺治《恒岳志》中的《疏纪》部分，记载了清初北岳移祀浑源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梳理山志修纂和国家认同有参考价值。关于北岳移祀浑源的过程，有学者作了详细研究，认为明代山西北部的军事形势，是山西境内北岳祭祀兴盛的重要原因，加之以帝都为中心的五岳观念，使得

①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职秩志》，第3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2页。顺治《恒岳志》卷中第59页，收录王濬初所撰《恒岳志旧序》，表明万历年间《恒岳志》已经得以修纂。王濬初即东阁大学士山阴王家屏之长子。

② 万历《浑源州志》卷首《凡例》，第1页。

③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牧守》，第3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2页。

④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上卷《牧守》，第3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73页。

⑤ 参见顺治《恒岳志》，刊刻于顺治十八年（1661）。知州张崇德在序言中，提到顺治《恒岳志》是在搜集岳志的残编的基础上纂修而成，表明在明代已经有完整的恒山山志。

⑥ 张海军的《浑源州古地方志考略》一文认为顺治《恒岳志》保留了万历《恒岳志》的相关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笔者通过对顺治《恒岳志》中插图分析，发现《五岳真形图》与《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卷》所录的崇祯碑刻一致，插图除《大清五岳五镇图》为清代所刻外，其余插图当系明代的版刻，因此张氏此说符合客观事实。

⑦ 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46页。



北京以南的曲阳祀岳失却优势，浑源之祀由此在清初得以定议。<sup>①</sup>可以说，北岳移祀浑源的过程，对于地方社会而言，是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大事。<sup>②</sup>然而，在确定了浑源的北岳祭祀后，围绕北岳祭祀的问题便开始全面讨论，讨论的重点是由浑源知州提出的6条。

卑职职掌攸关，难为缄默，谨将建置之缺者宜修，器物之少者宜备，仪文之略者宜隆，参考旧典，斟酌时宜，胪列六款，恭呈宪鉴：

一、修建宜举也。查得曲阳岳庙有御香亭，为供奉帝制而设，有东西朝房为使臣及陪祀官斋沐而设，神厨、牲房为烹饪、省牲而设。目今秩典新复，诸制未备，脱或举行，龙章凤藻，奉于何所？皇华天使，驻于何地？坎坛升血，瘞于何处？此皆不可缺者。然更有急焉。我皇上更正祀典，乃千载之盛举，可无贞珉颂功德以垂不朽？则碑与碑楼犹宜亟为修置。第工力浩繁，所费无算，若求给于国，值司农仰屋之秋，职不敢请；若取资乎民，则牂羊坟首之众，苦实难支。再四思筹，惟有权变之策。方今城学、桥关之捐输，咸荷恩纶纪录，矧岳事有关巨典，且利泽更不侔于桥关，仰恳宪台转申两院，求为援例题请，俾众捐修。……

祭器宜详也。……

祭器宜备也。夫祭必须笱豆有楚，而后黍稷惟馨。……

祭官宜办也。……

祭期宜定也。……

祭费宜增也。卑州额编春秋祭祀银八十两，诸祀所费悉取给于此，每岁不敷则设处挪借以益之。今祭品用鹿一只。浑邑素不产鹿，鹿必于他方觅买，值多十四五两，少亦不下十金，虽常秩可以羊代，而特典乃礼之必不可缺者。夫以有限之银，供多项之费，力穷势必累民，累民神有余恫焉。欲取足于香赋，而香赋无多。欲求增于正供，而正供有项。银在必加，策无所展。惟祈宪台酌议转请，如遇其年，于解司商税银内拨加银十两，以济其费，此亦衷多益寡之策也。<sup>③</sup>

张氏所列6款中，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是经费的筹措，包括修建经费和祭祀费用，当公文上至大同知府时，认为“当兹钱粮缺乏之时，凡事难以瘁办，本府不揣管窥，斟酌时宜，略为删减，以不失崇礼创祀之意”。具体的方案是：

御香亭费廉，可以创立。至朝房、神厨等木机砖瓦，置备既艰，而灰石、水土运转倍艰，即有天使仪曹，席棚布帐可以临时供用，待三年内丰稔宽裕，半为设处，半为募化，次第修举未晚。即云援学宫、桥梁，听乐输者自捐，记簿贮收，申两院给匾奖励。……三年特祭，拨加商税，未敢遽为定义。……

经过一段漫长公文讨论后，最后商议的结果是：

① 参见牛敬飞《五岳祭祀演变考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81—220页。

② 参见俞莉娜《明清浑源州城初探》，《建筑史》第3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6页。该文认为浑源城南门的开辟，与明代北岳移祀之争有很大的关系。

③ 顺治《恒岳志》卷下《疏纪》，第20—24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236册，第86—88页。

御香亭先宜创立，朝房、神厨、碑楼，次第营构，均为尊崇規制首务。当此旷典肇兴，即须整设弘敞，以成巨丽。一面估费，一面料理，计云中捐输若干，省会捐输若干，祀费之大小，合捐输之多寡。毕竣，或行题，或请宪奖，此在临时酌定者也。若云二三年后举行，恐日久懈弛，终成筑舍，募化更属空谈耳。……查仿曲阳祭器几何，设铸造几何，费一并入捐助之数。众擎易举，庶彼此不失矩规，而体统不致偏废矣。……如祭费一款，常祭议以羊代鹿，祭费需用一鹿。窃谓每年额编八十金，三年遇一特祭，不过在二百四十金之中，撙节济用，不必另议加添，以滋烦琐者也。<sup>①</sup>

至此，经过反复讨论，御香亭、朝房、神厨、碑楼等官方重要的祀典设施，成为创制的首要急务。知州张崇德便传集乡约及各行匠役、随从至恒山亲自察看形势，估算费用，根据考察发现：

恒岳峰峦嶙峋，坡阪 敬，殊乏平敞，即有坦境，而狭隘齷齪，不堪创建亭房。爰乃陟降崎岖，周回详视，惟有甘苦泉隙地百武。审其形势，虽属陡峭巨阪，后高前下，周市若用盘石甃砌，可成埧 台。即于其上建御香亭三楹，负坎向离，覆以琉璃，饰以金朱。左右各建朝房三楹，前建正门甬道，诚巍然巨构也。朝殿之东，微眇坦地，可建碑楼、神厨。此皆因地施力，易险为夷，以兴构造。此外，皆峻峭仄 ，虽人力亦无所施焉。其木植、砖瓦、灰石、工匠为项甚繁，其价不一，悉皆斟酌商较，合乎时宜，不敢奢以糜财，亦不致简而缺用，约银一千八百余金。内有驮运驴价，去银四分之一，盖缘物料非出所产，往返载运虽艰，势所必需者。铸造祭器，期合簠簋、笱豆之制，不敢过为宏巨，以失其度。故用铜斤无几。至于炉瓶烛灯，式已盈尺，足堪陈列矣。此皆于奉批估计而拟议之。若将朝殿、寝宫并加彩饰，原详未曾言及，不敢赘陈，或于修造之际，财力饶胜，再议修举可也。银两出于捐输，屡详已悉更无余议。若舍此而他谋，终将付之纸上空言耳。<sup>②</sup>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御香亭、朝房、神厨、碑楼代表了国家祀典所在，正是国家认同的标志，在恒山的兴修工程中，成为重中之重。由于“恒山崔巍峻峭，地鲜平敞”，“故正殿、寝宫不相联属，且皆狭隘区浅，殊乏穆沕深邃，不称神栖”<sup>③</sup>。由于地方政府经费有限，浑源州每年的大小祭祀银仅有95两。<sup>④</sup>这与工程建设的巨额费用，相差悬殊。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香赋收入也十分有限。根据《恒岳志》记载：

本山住持道士五名，贍庙地八十一亩，粮七斗二合零，羽流借以糊口。香赋岁入不等，每岁孟夏，士女朝岳所献，或鸡两翼，或羊二角，或牛四蹄，求其贡金一缗者无之。岁将所献之物鬻得十金便称赢，内给道士衣钵银七两二钱，余为修庙之资。<sup>⑤</sup>

恒山香赋每年收入只有10两不到，能够用于修庙的资金不足3两。这与清初泰山香税3万

① 顺治《恒岳志》卷下《疏纪》，第29—30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6册，第90—91页。

② 顺治《恒岳志》卷下《疏纪》，第30—31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6册，第91页。

③ 顺治《恒岳志》卷上《庙纪》，第16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6册，第26页。

④ 参见顺治《浑源州志》卷上《存支》，第48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180页。

⑤ 顺治《恒岳志》卷上《附庙祝香赋》，第1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6册，第26页。

多两的收入不可相提并论。<sup>①</sup> 恒山香赋收入主要来源于每年四月初八的朝岳活动，这是恒山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除此之外，其他时间恒山“杳无游览蜡屐之迹”，自然就鲜有收入可言。<sup>②</sup> 因此，开放捐输实属无奈，同时也势在必行。为此地方政府必然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做出必要的妥协，放弃香税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地方政府鉴于香税收入有限，长期把持必定开罪于民，对于民心的向化和民众的国家认同十分不利。因此到了康熙六年（1667），知州邓源革除了恒山香税上纳浑源州的陋规，其碑文如下：

寰区之山不可胜纪，而五岳之名峥嵘焉。以其为天枢地轴所由关，社稷禋祀所并重也。恒山北岳，属在浑邑，向因曲阳飞石之说，望秩大典，成具文久矣。自我皇清御宇中外，悉入版图，爰从廷议，改岁祀于恒山，甚盛典也。余刺是州，斯土斯民，岳实庇之，且岁庙孟夏恭庆，恒岳一大胜会。四方之绅衿善信，朝山进香者，或施钱帛，或舍牛畜，旧例令乡约监收，交州支用。余询及陋规，不禁为之太息曰：人将以物献神，而莅兹土者讵可返私神物乎？矧恒累经劫烽火，庑宇倾毁，修举尚属缺典，而本山住持衣钵无资，茶果莫供，亦神物不能为神享，是岂敬神之至意哉！余自顺治十八年冬莅任来，以迄于今，凡香税等物，皆令乡耆兼收，仍发住持度量工物，留为修葺神庙之助，而衣食不致窳之，香客可以少款，则是以民之敬神者应为神用，而神人欣悦，陋例永除不武，神灵之赫赫，鉴此在上也哉！历年以来，行之既久，日后相沿者，当以此为定则，无得借口往辙，仍蹈私匿。神物之愆将见，神庥普遍，香火永新，翊皇图而福黎庶，垂之奕无疆矣，爰用伐石刻铭以志悠久也。时康熙六年岁次丁未八月之望，奉直大夫知浑源州事邓源立<sup>③</sup>

地方政府放弃了无足轻重的香税，博得民众的好感。康熙二十年（1681）官府还革除了道府陪祀祭礼的劳仪。<sup>④</sup> 官府在恒山祭祀中革除陋规的种种惠政，对于地方社会而言能够起到对新王朝的好感，以此获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当然，将香税发交民间管理，未必就比官方经营的更好。到康熙二十四年时，原本5名道士住持的恒山，此时“常住黄冠仅三人，瘦同饥鹤，术乏折驴。……雨雪蚀亭台而湍泻，风涛震□□而飘零，环山庙貌如鳞空虚，一任摧折”<sup>⑤</sup>。经营之不善可以概见。当然这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此不赘论。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的妥协，求得地方绅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可以称得上清代政府统治地方策略之一。

## 余 论

通过对顺治《浑源州志》和《恒岳志》的考察，可以发现明清易代之际新附清朝的北方边塞地区通过地方志和山志的编修，表达了官方重建社会秩序和重构国家认同的愿望，其文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效果。地方志综合性的特点，决定其文献来源的多元性，很难用某一类文献的特点，概括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即使方志编纂者是有姻亲关系的家族联盟，在地方志中收录家谱的记载，就据此认定地方志族谱化取向，这样的解释也并不全面。<sup>⑥</sup> 明清时期的浑源州，鲜有

① 参见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税考》，《台大历史学报》第53期，2014年6月，第37页。

② 参见张应薇《重修恒山岳庙碑记》，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立于恒山恒宗殿，《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卷》，第109页。

③ 邓源：《恒山永革陋规碑记》，康熙六年八月立于恒山飞石窟，见《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县卷》，第103页。

④ 参见叶九思《永革陋规碑记》，康熙二十年立于恒山苦甜井处，见《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县卷》，第107页。

⑤ 张应薇《重修恒山岳庙碑记》，康熙二十四年八月立于恒山恒宗殿，《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卷》，第109页。

⑥ 参见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史林》2013年第5期。

族谱修纂，方志编纂几乎无谱可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世家大族对地方社会没有影响力，尤其是明代以来“右族联姻朱邸”，富家与权贵的结合，掌握了地方事务主导权。<sup>①</sup>在碑刻资料中，也不乏世家大族主导地方公共设施建设的例子。然而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中，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文本记载与社会实际情形脱节的原因，既有官方有意忽视的因素，也与北方边塞地区孱弱的士大夫传统有关。尤其是入清以来，士大夫更未能成为社会变化的主导力量。<sup>②</sup>士大夫无法熟练的掌握官方文化权力的话语，以主导地方社会文化的方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边塞地区文化传承的封闭性和文化传播的落后有关。其封闭性的直接表现是，学问学术的私相授受和传承，即浑源名宦栗毓美所谓的“士子家各为塾，塾各为教，不获群萃，州口相观而善之，益又无名师友提撕乐育于其间。见闻日就卑陋。是以登春秋榜者，落落如晨星焉”<sup>③</sup>。可谓一语中的。文化传播滞后性的直接表现是书籍传播的落后。通常而言，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是一个地方文化发达的重要指标。交通的不便是制约书籍传播的直接因素，作为北方边省的山西，尤其明显。诚如乾隆《浑源州志》所言“古人读书以为明道之具，今人读书以为进身之阶，是古今读书不侔矣。然必读书而有书可读，然后论其是非得失未晚也。其奈欲读书而并无书可读，何哉！山西边省，舟楫不通，贾贩鲜至，而浑源又边省僻邑，载籍尤眇。”<sup>④</sup>读书这一士子的基本权利，在边塞地区，竟是难以企及的奢求。这一局面即使在西学东渐的晚清仍未有根本的改变。<sup>⑤</sup>民国时期浑源知名士绅麻席珍在回忆幼年读书情形写道“家乏藏书，先母时以粟易某姓古籍多种，给曰‘吾家无力择师，汝师自在书中，努力求之’。”<sup>⑥</sup>即使是口头宣讲的圣谕，依据礼制当在旌善亭、申明亭举行，却因城内永安寺是民众祈祷丰穰的所在，官方也不得不移讲于此。<sup>⑦</sup>甚至不惜违制盖用黄瓦，以从士民之请求。<sup>⑧</sup>因此，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原封不动的向一个地方推行，灵活的变通是不得不做的妥协。乾隆年间的知州桂敬顺，面对佛寺前虔诚祷告的民众，不无感慨道“使祷而不应，彼固无损，使祷而或应，彼且谓佛信有法也。余又何必以知者所不信而阻愚者之必信哉！”<sup>⑨</sup>作为官方正统的儒学，在北方边塞地区的立足和发展的艰辛历程，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封闭和文化传播的落后，民众根深蒂固的佛道观，乃至异端信仰同样不应忽视。<sup>⑩</sup>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万历《浑源州志》卷1《风俗》，第7页。

② 参见赵世瑜《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③ 栗毓美《增置恒麓书院经费记》，光绪《浑源州续志》卷9《艺文上》，第12—1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573页。

④ 乾隆《浑源州志》卷3《经籍》，第25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295页。

⑤ 罗志田通过对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解读，注意到了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去看中国近代各地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参见罗志田《科举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的近代社会变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⑥ 参见麻席珍《教泽碑序》，《浑源麻氏族谱》，民国20年（1931）石印本，第25页。

⑦ 参见光绪《浑源州续志》卷8《职官》，第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542页。

⑧ 参见乾隆《浑源州志》卷8《寺观》，第1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357页。

⑨ 桂敬顺《重修永安寺记》，乾隆《浑源州志》卷9《艺文》，第50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第383页。

⑩ 浑源州的老百姓每年四月初五日朝北岳，而这一天正好是佛教的浴佛节，据顺治《浑源州志》上卷《礼仪》载“庶民，逢七延僧道忏悔。……病丧惑于巫释，甚而崇信异端，陷溺邪说。”由此足见及佛道乃至异端信仰对于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

Daoguang. It reveals the true pictures and value pursui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ir attempts of applying knowledge to practic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e and sericulture.

### **The Plain Confucianism Features of Daoguang *Zunyifu Records***

..... **Kong Weizeng** ( 35)

*Zunyifu Records* compiled by Zheng Zhen and Mo Youzhi during the Reign of Daoguang , demonstrates stress on the principle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solid evidence not only in its style and contents ,but also in its narration methods , all reflecting obvious Plain Confucianism orientation of the work. Its stress on ge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nts ,its textual research and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texts of classics in narrations ,and its truthful recordings of the process of textual research reflect its inheritance of textual research methods. The borrowing of textual research methods of Plain Confucianism and its features in narration methods of *Zunyifu Records* are undoubtedly the foundations of its Plain Confucianism orientation.

###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nd Local Society in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Hunyuanzhou** ..... **Zeng Wei** ( 44)

Through interpreting Hunyuanzhou local records and tablets inscriptions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start of the Qing Dynasty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nd local society during that period. The Qing government , through recognition of the Northern Great Mountain worship in Hunyuanzhou , accommodated the people ' s aspirations , and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the identity on the part of the local gentry.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local gentry , through compilation of the zhou records and mountain records , and constructions of worshipping facilities such as the Royal Fragrance Arbour , expressed national identity in rebuilding local order and reconstruct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Qing Dynasty by the local society , garnered favorable policies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and snatched practical local interests.

### **Drawing on History Experiences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 Brief Survey of Northeaster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 1911 – 1945)** ..... **Zhao Taihe** ( 56)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East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nsive. Along with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in China , traditional history studies began to transform towards new history studies.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trend of new history studies ,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borrowing and application of new history theories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 leading to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purposes , style , theories , and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local records studies , and far reaching influences on future generations. Discussions about Northeaster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during 1911 – 1945 are conducive to local records research in the Northeast , and provide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 for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the future.